

說 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八月底止，先后在吉林和辽宁两省朝鮮族聚居区进行調查。編写出調查报告（初稿）。以后由于該調查組的成員陸續分配了工作，离开調查組，这些調查报告便由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历史語言研究委员会协助整理出来，交給我們。为了保存資料，我們对这些調查报告仅做了文字上的初步修改，現在把它印出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从这些調查报告来看，我們感到，其中經濟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調查資料比較具体、全面；但相对的說，上层建筑方面的材料，如风俗习惯等，却显得比較单薄。有些反面材料，只做了現象的罗列，沒有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另外，有关人民公社部分反映的也比較少，因限于時間及材料关系，我們未做补充。其內容謬誤之处，亦在所难免，謹請同志們指正。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室
民族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目 录

概 况	(1)
-----	-------

政 治 部 分

一、解放前日伪、封建势力的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4)
二、解放后太兴大队人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6)
1. 彻底摧毁封建势力	(6)
2. 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	(8)
3.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9)
4. 社会主义大辩论	(13)
三、政权建设	(15)
1. 农会与贫雇农团	(15)
2. 村政权的建立	(16)
3. 普选	(17)
四、党的建设和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妇女会	(18)
1. 党的建设	(18)
2. 共青团	(21)
3. 妇女会	(23)

經 济 部 分

一、解放前的生产力	(26)
1. 农作物的种类	(26)
2. 农业生产工具	(26)
3. 耕作过程	(28)
二、解放前的生产关系	(28)
1. 阶级情况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情况	(28)
2. 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	(37)
三、解放后生产关系的改变	(38)
1. 土地改革	(38)
2. 互助合作运动	(39)
四、解放后太兴大队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46)
1. 农业	(46)
2. 副业	(57)

3. 供銷和信貸事业·····	(59)
五、水稻栽培 ·····	(61)
1. 一般概况和水稻生产的发展·····	(61)
2. 水利事业的发展·····	(62)
3. 水稻栽培技术·····	(65)
六、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	(75)
1. 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	(75)
2. 学校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77)
3. 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80)
4. 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85)
七、爱国卫生模范的一面紅旗 ·····	(88)
1. 解放前太兴村的卫生情况·····	(88)
2. 解放后到一九五二年的卫生工作情况·····	(89)
3.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卫生工作情况·····	(91)
4.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92)
5. 爱国卫生运动所取得的經驗·····	(93)

概 况

太兴是屬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延吉县朝阳人民公社太兴管理区的一个生产队。位于北緯42°58′，东經29°28′。于延吉市西約30华里处，正南距长图綫上的朝阳川車站只六里多。这儿环山傍水，向北是条狹长的平原。周围主要的山峰有磨盘山、帽儿山、馬鞍山、鸡冠山、偏臉城等。水源充沛，主要河流有布尔哈通河，朝阳河发源于北一百余里的三道灣，經太兴汇入布尔哈通河。

太兴四邻村落較多，正南六里是朝阳川，西隔鸡冠山与太平沟接壤，順路北行六里即到达横道村。

这儿气温最高是37°1′C，而最低是零下30°3′C，平均温度是5°4′C，降雨量每年平均48.9毫米，无霜期約一百四十一天左右，結冻期約二百一十五天（九月二十日到翌年五月三日），风向：冬天西风多，夏天东风多。

土壤以粘重土（黑色）和灰化土为最多，其次有砂質壤土、淤泥等。

太兴生产队共有四百零八戶，其中朝鮮族三百零八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四九，汉族一百戶占总戶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一。全生产队共有一千九百七十一人，其中朝鮮族一千六百一十三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八。汉族共有三百五十八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一七。在总人口当中男九百五十六人（其中朝鮮族七百九十五人，汉族一百六十一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五一，女一千零一十五人（其中朝鮮族八百一十八人，汉族一百九十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九。

历年来人口变化的情况統計如下

年 度	戶 数	人 口	每戶平均人口
“九一八”前后	95	667	7.02
解 放 前 夕	286	1,646	5.76
1 9 4 8 年	365	2,030	5.56
1 9 5 1 年	376	1,946	5.18
1 9 5 4 年	382	1,934	5.06
1 9 5 6 年	385	1,997	5.19
1 9 5 8 年	408	1,971	4.84

太兴生产队共有劳动力八百零四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九，其中男劳动力三百五十九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六。

太兴生产队劳动力分配情况如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七百七十八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七六，从事农村工业生产的有二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零.点二

三；从事畜牧业的有八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零点九二，从事商业的四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零点四六；从事文教卫生事业的有十三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点五一；从事公共福利事业的有一名，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零点一二。

太兴居民分布形成南北縱列的六个自然屯中，朝鲜族多集中于居民点，汉族多散居于西山坡上。

太兴生产队，共经营土地五百五十一垧，其中水田三百四十一垧，旱田二百一十垧。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近七亩地的耕地。

太兴经营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其次是旱田，旱田作物主要有谷子、苞米、高粱、大豆等。

〔太兴开发简述〕

一八七零年即清朝光緒年間，太兴四周还是一片荒地，树木成林，杂草丛生。那时候，方圆数里之内疏疏落落地住着王家、郎家、田家、孙家、沈家等十余户汉族。

上述各户刚来时，地广人稀，土地无止境。加上这儿临近边域，清朝政府鞭长莫及，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这样他们凭着没有苛赋杂徭的负担，渐有积蓄，从而具有了“占山”的条件。

所谓“占山”，就是向官府报垦领照。当时延吉设有延吉所，凡是要“占山”的人都需到这儿领取地照。在地照上面写着占山人的姓名，占有土地的四至，其中的生荒亩数和熟地亩数。俗语说：“奉上钱粮不怕官”，意思就是说：只要能交得上钱粮（每垧地缴纳银两三钱），那就可以开荒占地，成为“占山户”。

然而，“占山户”过程不久便告结束。民国初年虽然四面八方依然是森林密布，鸟飞兽行，但是无止境的土地早已绝迹。后来的农户只好向“占山户”租借荒地，垦田耕种。这些后来者其实是在本村进行开发的主力，他们在那时从早到晚用粗重镐头斩荆劈棘，使一片片的千年老林变为良田美地。然而，他们的劳动不过是使“占山户”的田土日辟，丰裕了他们的家私。

当时投奔此地的汉族绝大部分都是“占山户”的同里同乡和亲戚朋友。这些人在原籍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剥削与压迫，生计无着，一听说乡里人和亲友在这占了地，就率妻领子投奔这里，指望在这里改变一下穷苦的处境。然而事实上，来到此地也并没有摆脱掉封建剥削的桎梏，有的在“占山户”家中吃劳金，起早贪黑的去开荒种地，当时衣不暖身，食不饱肚，劳动一年，很少积蓄。有的从“占山户”那儿佃来小片土地垦种，头两年或者三年内虽不交租，但此后土地就归“占山户”所有了。

当“占山”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这儿没有土地买卖的现象。但荒地被占为己有以后，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当时买卖土地都有中间人，双方成交后，中间人可从中得到一定的报酬。至于地价，每垧地约四十元左右。购买土地的人，有些是勤劳克俭之家，稍有积蓄，买来小片土地，有了自耕地，即成为自耕农；也有些是富裕大家，整片整片地购买土地，称之为“买山户”。“买山户”和“占山户”都是地主，只不过是他们的土地来源不同而已。当然，有的地主的土地既有“占山”时占来的，也有“买山”时买来的。如太兴土改前夕大地主沈家就是如此。

过去的“占山户”和新产生的“买山户”变成了地主，很自然地他们也就有了和官府勾结的资本。当时官府每隔几年就要派人到各处去“丈地”，核实熟地亩数，登科课税，以增加官府收入。“丈地委员”到太兴时，总是住在大户家中。大户对“委员”多方“招待”，广行贿赂。这样，“委员”们丈地时就能大为“通融”。丈地总是先从小户人家的土地开始。“委员”的随役们用量绳在小户占的土地上随意比划，他们说这是多少地，就算多少地，小户人家不敢置一词，而地主却能够在“委员”的默许下任意漏报土地和逃掉赋税（即应交的粮）。

一九一〇年以前，太兴有十余户朝鲜族农民。日寇“吞并”朝鲜后，一些朝鲜族农民不能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暴压，纷纷离乡过江，迁入延边地区。迁到太兴的朝鲜族农民，是从朝鲜的吉州、城津等地迁来的。到一九二〇年前后，朝鲜族才大批迁来太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太兴朝鲜族农民已有六十八户了。

新迁来的朝鲜族居民绝大部分都是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用“劈格子”分租的方法交租。由于迁来较晚，平坦好地都已开垦完毕，只好租垦遍生树木的西山坡，在朝鲜族农民的辛勤劳动下，西山坡也终于由荒山变为良田。自从朝鲜族迁入后，利用这儿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大开水田，种植稻谷。太兴改开水田的年代是一九一五年，但是数量很少，只有十几垧，而且主要是在河套一带。到伪满时，由伪“水利组合”在太兴开挖壕渠，开水田一百余垧，此后水田渐有改开，到解放后进行土改时，水田已经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迁来太兴的朝鲜族中间也同样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过程。其中有：地无一垧的贫雇农，也有田以数垧、数十垧计的地主、富农。如民国年间迁居太兴的朴世举，就曾经买过李姓地主的二十五垧（二千坪为一垧）好地而成为当时本村的大户之一。又如千子范，也曾有过十垧水田出租剥削，成了小地主。还有韩正石、崔承权等人，也除自种几垧地外，其余剩下的土地租给贫农，成了富农。另外，当时也有几户朝鲜族买土地后自耕自种的。自然，当时朝鲜族中绝大多数都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汉族农民一样，呻吟在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之下。

朝、汉两族地主是依靠剥削两族贫苦劳动人民发家致富的。如，本村土改前夕的首富沈家，本来在“占山”的时候只占了一小片荒地，招人开垦和耕种，后来朝鲜族迁入便抬高剥削率。这样一来，他家的“景况”便扶摇直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十年只有十几垧水旱田，到“九一八”前后则已经霸占了一百五十五垧地，而在伪满时代，他家的土地就激增至三百七十余垧。家里盖起了砖墙大院，又喂了十二个牲口，拴了两辆大车。朝鲜族地主（外地地主）全河君靠着剥削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不仅穿绸缎，而且来本村收租时还坐着小汽车。

富何以富，穷何以穷？太兴的地主、富农，依仗反动统治阶级势力，霸占土地，肆行剥削劳动人民，而太兴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自解放以后，太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土改运动，才得以翻身而成了土地的主人，并且根据党所指出的方向——集体化方向不断前进，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摆脱了贫困。目前他们正在信心百倍地办好人民公社，为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

政 治 部 分

一、解放前日伪、封建势力的統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朝鮮族迁来太兴村約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就是在此地开发后二、三十年才迁到太兴来的。朝鮮族迁到太兴时，这里的地已集中到几个地主手里。因此，后来的汉族和朝鮮族人民就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些地主把“占山”的土地租給劳动人民开垦，扩大剥削范围。同时，又和官府勾結在一起，隔几年进行一次“丈地”。通过“丈地”吞并劳动人民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势力，侵占延边后，从政治上、經濟上加紧压迫和掠夺农民。“九一八”前后，日寇經濟掠夺机构——“东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封建地主已經在太兴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而占絕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因而广大劳动人民只得租种“东拓”和地主的土地。再加上統治阶级繁重的苛捐杂稅和“东拓”、地主的高利貸剥削等，劳动人民終年劳动，还是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在“九一八”前后太兴相繼遭受过日寇十四次屠杀与扫蕩“討伐”，被杀害了无数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被烧光了无数的房屋和财产。

同时，“东拓”又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掠夺土地，放高利貸，进行残酷的剥削。“九一八”时期，“东拓”强占土地达九十三垧，到解放前增加到二百二十五垧。借“东拓”和地主的高利貸的农民，从“九一八”时期的四十四戶，到解放前增加到一百五十八戶，其利息一般一点五分至五分，甚至有的借十分利的高利貸。由此可见，“东拓”和地主，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是如何残酷了。

“九一八”后，尤其是日寇发动“大东亚战争”后，劳动人民陷入了更悲惨的处境。日寇为了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用“出荷”的名义，从农民手中搶去粮食，强献“国防献金”，强購公債，强賦各种杂稅，以充当侵略战争的軍需。他們不仅在經濟上进行搶掠，而且还用“皇国臣民”的义务等借口，每年都强迫劳动人民去充当“皇軍”、“奉仕队”、“奉公队”等奴役。在太兴强迫当过这些奴役的人有七百八十名。

同时，协和会、警察署等統治机构，还監視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如有“違背政策”的則遭受打罵、扣压、送“奉仕队”等等严酷的惩罚。

总之，解放前太兴人民也和其他地区人民一样，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但是太兴人民在这种野蛮的統治下，并没有屈服于日寇和封建地主阶级，一刻也沒有忘記浸透骨髓的阶级仇恨，而进行了多次的公开的和隱蔽的反抗斗争。

一九三一年初，太兴社成立了反日会、反日青年会和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組織。太兴朝鮮族中間有一半以上参加了这些組織。

同年七、八月間，成立了中共延吉县八道区委。同年秋，区委领导太兴人民进行了爭取“四六”减租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除太兴人民外，还有其它村庄的农民約一千余人。农民齐集于当时乡长家門前高呼取消“五五制”地租，实行“四六制”地租的口号，乡长命令保卫队开枪威胁，但絲毫动摇不了农民的斗志。斗争坚持到一天一夜。后来，前来送飯的妇女也参加了斗争，乡长見威胁无效，就想化装成女人逃走，但被农民阻止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乡长只得同意了农民的要求，宣布废除“五五”制地租，实行“四六”制。后来地主虽然没有履行其諾言，但这次斗争却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力量，使农民認識到“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沉重地打击了地主以及其他反动势力的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投降分子給日寇提供情报，并給日寇軍警开道引路，对太兴进行前后十四次的“討伐”和屠杀。因而革命組織全部被破坏了。

日寇对革命群众及无辜人民进行残无人道的屠杀。有一次，住在太兴的中共延吉县委书记×××的母亲和娥娘，为了完成党交給的任务到朝阳川去买印刷传单用的紙张时，被敌人发觉而惨遭杀害。另一次，日寇突然围住太兴，把人們都赶到了沈家大院（地主）按屯别分开后，从各屯中找出一个小孩，逼迫这些孩子来唤自己屯人的名字，如不能唤出名字的人，即認為“共匪”。不幸有两位革命同志被发现，當場就被枪杀了。崔炳山老人看此情形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大罵日寇而遭惨杀。

在太兴最大的一次惨案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这一天，党八道区委負責人童太浩、許学天、童基浩、韓正三等正在开会时，村子突然被日寇包围，四位同志全被俘，敌人用刺刀把他們刺死后，又把他們的尸体扔进正在燃烧着的房子里。

經過十四次的烧杀，太兴变成了血海废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三一年冬天的几个月中太兴惨遭杀害的革命烈士和群众达二十余名，被烧毁的房子则达二十多幢。

尽管如此，革命人民的怒火并没烧尽。一九三一年十月的一个拂晓，日寇“討伐”队突然襲击太兴。这时党的工作者許鶴三正在村中工作，当他知道已經不能脱身后，就到貧农許学瑞家来躲避。当时如果隐藏革命者而被日寇查出来，就全家要被杀。但許学瑞不顾这一切，急忙把許鶴三藏在棚上，脱过了日寇的搜查。

由于日寇的猖狂烧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革命同志暂时离开了太兴，有的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的群众离太兴以北百里多的三道灣，加入了“大刀会”。这些群众为了装备自己，亲自打制鉄刀，与日寇繼續展开了頑强的斗争。后来这些組織合并于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更出色的活跃在敌占区，展开抗日武装斗争。

在日寇統治十四年的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太兴人民以沉痛的心情，把革命同志的尸体掩埋起来，把血海深仇牢記在心里，等待着复仇时刻的到来。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位倔强的朝鮮族老人朴文寬，当他儿子被日寇抓去当兵时，就对自己的儿子說：“你到那儿要好好訓練，練好枪法，到战場，你就反正过来，打鬼子，为人民报仇。如果你被打死，我就杀死几个鬼子替你报仇！”这就是当时太兴劳动人民对日寇强迫人民去充当炮

灰的回声！

二、解放后太兴大队人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1. 彻底摧毁封建势力

一九四六年六月，党所组织的工作队来到太兴，立即宣传与动员人民，组织了农会，并领导农民进行“借粮”“分青苗”斗争。

当“借粮”运动和“分青苗”斗争开始时，有些人还有顾虑，总觉得东西是“人家”的，而不敢拿。地主也狡猾的把粮食藏起来，抵抗“借粮”运动。党员和农会干部就率领群众与地主进行斗争。例如：当狡猾的地主沈灏知道农会要对他进行查粮时，他就到处去苦叫“自己没有粮”。于是党员婁久云和石芳镇就提出进行检查，群众在党员行动的影响下，就对沈灏家进行检查，结果查出许多粮食和物品。婁久云同志向群众说：“这是我们贫雇农血汗造成的，是我们的。”把查出来的粮食、衣服、鞋分给查粮的群众。这次借粮运动不仅解决了贫雇农粮食和衣服的困难，而且更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接着工作队就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起初，个别农民认为本村的地主都不是恶霸，他们的土地是正文买来的，自己过去虽然生活不好，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给地主交租，那是因为种了人家土地。甚至有个别农民说：“五五”租对穷人也有好处，因为要是丰年都有所得，要是欠年，地主同样也得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挨户串门，把谁养谁的道理讲给农民听，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老底。并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取消“五五”对分，实行“二八劈格子”（即八成归农民所有，两成是交给地主的地租）。同时在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又以丈地的方式进行“分青苗”斗争。

在这一过程中，地主采取一切办法进行破坏和顽抗。比如地主沈永久到处散布谣言说：“国民党再过十几天就要来，那个时候要把全部农会的人都杀光。”地主沈桂甚至公开对农民说：“我作梦也盼望国民党来”，有的地主更以行动恐吓农民。地主王广顺，当农民到他地里分青苗的时候，他就把参加分青苗的农民的姓名都记下来，企图以后反攻倒算。有些地主则公开骂农民是“胡子”（即土匪），“是邪不归正，不能长远”。地主这一切阴谋诡计更加激起了农民愤怒的火焰，农民曾多次将地主围住，当面质问与斗争，迫使地主在农民面前低头认罪。为了确保斗争的顺利发展，太兴农民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民兵队。

一九四七年四月，成立了贫雇农团。六月，土地改革运动便全面展开。首先把太兴所有地主的财产，全部查封，地主本人也由民兵加以监禁，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紧接着就开始了斗争。

第一次斗争的对象是沈家（沈桂、沈灏、沈源等）、王广顺、金河均等。沈家七兄弟是太兴的老户，也是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土皇帝”，他们靠着对佃户和劳金（长工）的剥削，田产日增。到土改时，他家在太兴就有地三百多垧，在和龙也有五十多垧土地。沈家盖有砖房大院，喂了八个牲口，拴了两排车。这一家人都是些吃人不见血的伪善人。

表面上是笑臉，暗中使手段，平时用小恩小惠籠絡穷人。所以刚开始斗他的时候，个别农民还認為他是“好地主”，在控訴会上，貧雇农以血泪史的控訴，戳穿了他伪善的面孔。貧农刘凤林控訴說：“我給他們家扛了二十多年的长工，受苦受累，最后因病辞工的时候，却分文也沒有得到”。崔泰鉉控訴說：“我給沈家干活，經常受到地主的打罵，不等天亮，沈家老八沈灝就催我下地，稍微晚了些，就要挨打受罵。有一年正月我借了他們家一石粮食，到九月就得还他一石五”。石芳鎮有一年在沈家吃劳金，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但狠心的地主却逼着他上山去打柴。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儿地主还有好心腸。通过控訴，农民更清楚的認識到地主的丑恶面目。

在被斗争的恶霸地主中，民憤最大的是日寇的走狗金龙烂。这个家伙在伪滿时期，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飯，附近村庄的人大部分都被他打过。他为了执行日本主子的“不准人民吃大米”的命令，就封碾、封磨，并常到各家进行检查，誰家有大米或揭封推碾，一旦被他发现，那就要大祸临头。对这样无恶不作的恶霸，人民給予他最严厉的制裁。

总之，在土改运动中，太兴人們訴苦数达四千五百余件，查出四十多项重要案件。比如查出曾残杀我两名地下工作者的崔永植，經群众斗争之后于朝阳川枪决；查出并清算了地主刘虚华，查清了崔查松叔叔被金成基的姐夫暗害的案件；揭发并清算了太东富农許万燮。

当土改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地主分子則由公开的抵抗轉入暗中的破坏，采用卑鄙的拉攏、行賄等各种方式，以阻撓和破坏反封建斗争。但都被觉醒了的农民所破。地主王广順在土改正在深入开展的时候，装出一幅“好人”像，送鸡、送面給当时农会会长婁久云，被婁久云同志當場揭穿了阴谋。当地主沈家叫远不着近的亲戚（当时的一个民兵）埋藏东西时，也立即被揭发出来。甚至有的地主把自己的儿媳嫁給貧雇农，以求庇护。地主沈永久拉攏貧雇农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偷听情报，并趁复查之机叫喊“自己被斗錯了”“冤枉”，公开將已被沒收的东西拿回去。对这种狂妄分子，农民予以逮捕。

当一切阴谋詭計都不能得逞的时候，地富分子則采取晚間阻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手段，进行威胁。但这一些也都被組織起来的农民所揭破。

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党都貫徹了坚决依靠貧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綫。起初，中农的态度表現得十分动摇。特別有的富裕中农，过去也曾雇过短工和吃租，这时就更害怕斗到自己头上。工作队和貧雇农团就經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貧雇农和中农应该团结起来的道理。并一再解释，只对剝削量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地富分子进行斗争。这样中农的疑虑在运动中逐渐被打消，但由于其阶级本性所限，所以仍然有些人忧虑而不积极参加斗争。

从一九四六年冬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春，太兴共斗争了二十四个地富分子，平分了土地和沒收了粮財，彻底地打碎了束縛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鎖，使农民从封建压迫与剝削中解放出来。从而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成为太兴的主人。

2. 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

一九四六年，在工作队领导减租减息、查粮斗争的时候，太兴许多青年踊跃参军。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和解放全中国，就形成参军的高潮。共产党员尹起弘同志首先带头报名参军，接着就有六十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崔东焕同志结婚不到十五天，也离别了新婚的妻子，参加了军队。四十五岁的朴敬赫老人参军的劲头也不示弱于青年。朴敬赫老人是一个贫农，解放前穷的连妻子都娶不上，土改时他分到了土地和财产，并且结了婚。他深深知道这样的好生活是怎样得来的。因此当政府号召参军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地参了军。而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事情在太兴不是个别的。当时除了被斗的地富分子外，所有的青年差不多都报了名。据一九四九年统计，太兴参军的共有八十三名。

一九四八年金石权、沈相俊、金学周等二十五名同志参加了担架队，李龙男等十六个同志参加了运输队。

这些同志在战斗中，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战斗中，杀敌勇敢。许多同志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比如金石权同志参加担架队后（参战时为候补党员），战场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立下了五次大功；沈相俊同志立下了四次大功并于火线入党；崔炳善同志参军后立了一次大功；朴学国同志立了一次大功和一次小功；太明元同志立了两次大功……等等。

在后方的太兴人民也积极地支援前线。早在一九四五年民主联军成立时，太兴人民就做了一百五十双草鞋，一千二百五十双布鞋，支援了民主联军。

太兴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前方的战士吃，除此之外，也积极地给劳动力不足的军属代耕，据一九四九年统计，七十六户军属中受代耕的有十八户，代耕面积二十四点六六垧。一到春节村政府就组织人民到军属家拜年，有时也组织晚会慰问军属。更加鼓舞了参军同志的斗志，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

因此，太兴人民也为缔造祖国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发动了侵略战争，威胁着朝鲜人民的独立，中朝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太兴人民在这次运动中也充分发挥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这时期，太兴人民也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参加志愿军的共有八名，战勤人员十七名，此外还有一些翻译人员。在这些同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太明元同志在战斗中获得一级和二级国旗勋章各一枚，一级荣誉勋章一枚，军功勋章二枚。许学松同志也获得一枚二级荣誉勋章。

太兴人民也热烈展开捐献运动，平均每家捐献朝鲜族固有的铜器三件到五件，并又捐献了五万五千元，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

一九五二年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组织了爱国丰产委员会。委员会提出每垧产量六千五百至七千斤的指标，各互助组展开了竞赛。金承斗互助组提出一项高额丰产计划，指标是“元子一号”稻，每垧产量为一千七百斤，“小田代号”每垧产量九千斤。太兴

人民学习了金承斗互助組的干劲，苦战了一年，結果水田每垧产量由解放前四千五百斤增加到七千八百斤，超额完成了爱国丰产委员会提出的指标。

一九五二年，太兴人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全村齐动员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的细菌战，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太兴人民的优抚工作有很大成绩，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全村烈、军、战勤、荣军、干属共有一百零九户，五百零一人，其中劳动力有六十名，女劳动力有一百三十二名，共有水田七十二点八三垧。代耕面积有水田二十三点二四垧，旱田二十七点三二垧，共计为五十点五七垧。被代耕六十二户，全村被代耕者有男二百零七名，女二百零六名，代耕员每个劳动力担负耕地标准为旱田零点二二三垧，水田零点零八垧。

为了搞好优抚工作，加强了优抚委员会的力量，由党支部书记、村长、委员会的主任，并选举十三名积极分子为委员。在委员会下设有代耕联合组，组下面又设有小组。优抚委员会每月开一次会，代耕联合组每季度开一次会，进行检查代耕工作。在村人民代表会议上，确定了代耕地面积、质量标准 and 代耕对象，然后以各小组为单位召开烈军属座谈会，在会上烈军属自报被助耕的土地面积，并且在助耕员和烈军属之间订立“保量合同”，规定每垧旱田保产三千五百四十斤，因此保证了代耕地的产量。比如一九五二年代耕地的产量，水稻每垧比前一年增产二千斤，大豆增产了一百五十斤。

而烈军属也积极参加了生产，一九五二年就有百分之九十的烈军属参加了互助组。烈属朴昌权老人由于积极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曾当选为卫生模范和全国的烈军属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3.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地粉碎了束缚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农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的生产兴趣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但是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个体的经营方式，远不能够最终使农民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于是党提出“组织起来”的号召，指出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太兴人民热烈的响应了党的号召，在一九四八年就出现了许多季节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由于党的不断教育，农民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组织起来比单干优越的具体事实，参加互助组的户数不断增加，一九五〇年是季节性互助组发展的高峰。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坚决贯彻了党的“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改造富农”的阶级路线和自愿互利原则，并以不断革命的精神，使运动逐渐深入，进入更高级的形式。一九四九年，在太兴出现了四个常年互助组，参加户数仅有十七户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五二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十七个，有一百六十户参加，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占组织起来的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一九五二年开始出现了比常年互助组更高级的包粮组，这一年太兴共有五个包粮组，有六十户参加，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十五点八。一九五三年已经发展为十个包粮组，有一百三十七户参加，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五。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太兴互助合作运动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初级社阶段。这一年在太兴出现了三个初级社，共有四十户参加，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点五四，到一九五五年则发展到十五个初级社，有三百三十八户参加，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这一年除了初级社以外，还有三个互助组，计三十户。总之，这一年太兴农民除了十二户单干户以外，全参加了互助合作。

由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从一九五四年就开始组织联合社。一九五五年则发展为三个民族联合社。

一九五五年冬毛主席所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极大地鼓舞了太兴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已有的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在农民迫切的要求下，太兴的互助合作运动终于在一九五六年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全村组织成了一个民族联合高级社，共有三百八十二户参加，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八。一九五七年则有三百八十八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六。

总之，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太兴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按着党的指示，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太兴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不断地打击地富分子的破坏活动，并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

在互助合作的初期，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立刻接受党的互助合作的政策，甚至有个别党员也反映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抵触情绪。党支部严厉地批评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件事深深的教育了每个党员同志，更加明确的认识到互助合作的意义。因此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党员同志都起到了动员与组织群众的作用，推动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出现了一些“中农组”和“富裕组”。“中农组”是以老中农为主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富裕组”是以劳动力强，工具和耕畜充足的农户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都拒绝贫农及军烈属等劳动力弱、缺少生产工具和耕畜的贫困户参加。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则是自私自利较浓厚，组内经常有纠纷。比如以中农为组长的李明男互助组就是由五户中农、两户贫农所组成的“中农组”。

此外也有些互助组，只是形式上组织起来了，但实际上却没有起到互助组的作用。比如郎永财互助组，虽然在表面上组成了，可是生产中却不进行互助，仍然单干。人们把参加这样互助组的人叫做“组织起来的单干户”。

也有个别人，不响应党所提出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坚持走单干的道路。

党支部根据出现的这些保守思想和资本主义倾向，采取以下几项重要措施，使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是培养典型互助组，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摸索经验，以点带面。一九四八年开始组织季节性互助组时，党支部就把郑浩俊互助组和朴基龙互助组做为重点。这两个互助组阶级基础好，全组都是由贫农组成的，同时群众觉悟及对互助合作认识也较高。这两个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与培养下，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以郑浩俊互助组为例：一九四八年夏锄季节，参加互助组的共六户，组成了季节性互助组。一九四九年由季节性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这一时期，六户买了两台水稻脱谷机。一九五二年由常年互助组转到包粮组，这一年实行了小包工制，取得了空前的丰收，同时主要生产工具实行入股，又建立了畜舍。一九五三年由包粮组转为初级社。当年十月，耕畜和车辆都实行入股（此时其他初级社还没有入股）。又新建了一所烤烟房和猪圈，购置了脱谷机和座秤各一台，同时开始积累公益金和公积金。一九五六年则加入了民族联合高级社。

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产量年年提高，就是在灾害最重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组员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一九五四年为止，参加这一互助组（初级社）的十三名组员中有六户购置了碗柜，十一户打了洋井。

以一九五一年为例，在生产方面和单干户比较如下：

	郑浩俊互助组	金昌先(单干户)
	6户，29口人	1户，5口人
一般情况	劳动力： 男3，女6 耕畜：牛两头半 耕地面积： 水田4.04垧 旱田4.42垧	劳动力： 男1，女1 耕畜：牛半头 耕地面积： 水田0.8垧 旱田0.9垧
水田春翻	1.62垧水田进行两次春翻	只进行一次春翻
锄草	0.805垧水田采用锄草机锄草，其余的锄三遍。 谷子：四耨三耮 高粱：三耨三耮 苞米：三耨三耮 大豆：二耨三耮	水田锄草两次 谷子：三耨二耮 高粱：二耨二耮 苞米：二耨二耮 大豆：一耨二耮
插地时间	水稻：7月5日~7月20日 旱田：6月5日~7月25日	水稻：7月10日~8月3日 旱田：6月15日~8月10日
水稻移苗的时间	6月15日~6月25日	6月20日~7月5日
积肥	153车	5车
秋收时间	10月3日~10月27日	10月7日~11月2日
秋翻	水田：0.25垧 旱田：1.20垧	无
选种	稻子：620斤 旱田：全部	无

副业收入	旧人民币 140 万元	无
产	水稻： 每垧平均 7,397 斤	水稻： 每垧平均 4,600 斤
量	旱田： 每垧平均 2,170 斤	旱田： 每垧平均 1,150 斤

由上表即可清楚地看出互助组要比单干户优越得多。党支部就以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向群众进行教育。因此第二年，郑浩俊所在自然屯的单干户百分之百的参加了互助组。

其次，党支部也采取边整顿，边教育的方法。支部直接抓基础薄弱、存在问题的“中农组”和“富裕组”进行整顿和教育。培养其中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并对那些排斥贫农的组员进行合作化的方针政策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和整顿，改变了原来互助组的面貌。对经过教育和帮助还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些互助组，进行调整，根据自愿的原则，把他们调配到有基础和先进的互助组里去。而比较顽固，坚决要退出互助组的农户，则不进行调配。

再次，党支部也抓典型事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群众进行教育。如一九五一年，单干户崔基柱，因为在农忙时期得了病，不能参加生产，结果一年的庄稼撩荒了，因而收入不多，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正好这一年参加互助组的李万石和崔基柱一样也得了病，不能参加生产，可是他的地，组里都给他侍弄好，结果收成没受到多大影响。这一事实深刻的教育了单干户。再如互助组初期，个别的军属不愿参加互助组，只等待群众的帮助。党支部就以军属崔龙顺的事例进行教育。崔龙顺是军属，由于他参加了互助组，积极生产，因此就比单干户多收入七十多元。同时，由于组里分配给他的工作适当，也不象其他单干户军属那样忙累。通过这一教育，许多军属也积极地参加了生产。

再其次，层层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扩充互助合作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九五二年为了使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党支部有计划的培养兰志武、郭显学、郎文芳、安基柱、郑浩俊、许龙哲、崔南先、崔钟根等二十名朝鲜族、汉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这批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阶级成分好，政治觉悟较高。其中中农成分的有三名，贫农成分的有十五名，雇农成分的两名；党员八名，青年团员五名，积极分子七名。党支部每隔十天就召集这些同志集中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有关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全国著名的互助组的经营管理等。同时这批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自己所在的互助组里培养骨干力量。象这种骨干力量就有八十多名。

党支部不仅是通过这批干部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亲自动手，分工负责对各互助组进行领导。如：党支部书记郑道俊负责四屯，崔泰铉（村民政委员，现任社副主任）负责一屯，村长金日山（党支部委员）负责五屯，崔炳善负责三屯，婁久云负责汉族互助组。

由于对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及党支部分工负责亲自领导，有力的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在互助組轉为初級社时，也有些人犹豫不决，如中农金貞淑开始时覺得入社后土地、牲口都入股，又不自由。后来經過大家的帮助，終于認識到自己看法不对，他就参加了初級社。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还有个别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参观者”。这一名称的起源是这样：中农齐凤，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始終动摇不定。一九四九年参加季节性互助組又退出；一九五〇年参加常年組又退出；一九五四年参加包粮組又退出；一九五五年参加初級社又退出；一九五六年参加高級社又退出。但是事实教育了他，因此当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他坚决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并表示再也不退出去了。

这种資本主义的傾向不仅表现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而且也表现在統購統銷問題上，即表现在一些人隐瞒粮食，企图投机倒把。如新中农許益松、韓泽俊、郑明俊等人，在統購統銷实行后都違反政策，在自己家里挖窖洞暗藏粮食，想卖给私人获得高价。又如张升有在一九五七年密运六斗粮食到朝阳川去出卖。一九五四年三定政策施行后有些中农对三定政策表示不滿，存在着抵触情緒，如新中农韓益善說：“这样把全部粮食都收回去我們就得餓死”。对这些資本主义傾向，党支部都进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

太兴人民对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的地富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地主分子沈永春，一九五三年在某一互助組当文书，組长叫他布置組員阴天到水田去除草，晴天到旱田除草。但是沈永春却告訴組員：“阴天水冷不要到水田去除草，天晴的时候再到水田劳动”。結果当年这一組許多庄稼都撩荒了，互助組也垮了。他又在背后挑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說：“咱們队长沒有工作能力，他不能灵活的执行上級指示，总是死刻板板的。評工不及时，評的也不合理”。对这种破坏活动，太兴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重新給他戴上地主的帽子，实行管制。

富农許彩云，在一九五七年趁我粮食紧张之机，老喊粮食不够吃，向国家要粮，国家发給他粮食后，他就把粮食磨成面粉吃。金学洙同志对这种行为在会上进行了批評，而許彩云則大罵金学洙同志：“真不是个东西，非把你烧成灰叫风吹走了不可……”群众剥开了她这种丑恶的面目，她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認罪了。

反动分子許明玉，对新社会怀着仇恨，并将这种思想灌輸給他在小学讀書的儿子，因此他儿子經常身帶小刀，在学生中散布說他要报仇。警覺的人民发现了这一罪行，重新将他管制起来，不准他乱說乱动。

总之，太兴人民严厉地打击了一切地富分子的破坏活动，同一切資本主义势力傾向进行了斗争，坚决按着党所指的方向——社会主义前进。

4. 社会主义大辯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場改变所有制的斗争，是走資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反映。为了澄清思想，明辨是非，提高認識，在党的领导下，太兴于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辯論。

一九五七年冬主要以李长青走富农道路一事为典型，集中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李长青给地主扛了二十多年长工的老跑腿，土改时当过贫雇农团长，因为他是单身汉，所以分配果实时得了双份。土改后，他卖掉了自己得的二亩水田和一头大牛，用这笔钱买进了三垧旱田。这些土地除自耕一部分外，其它部分都租给别人，租额是一垧地一年一石大米。地租收来后，又转借给别人，利息是春借一石秋收还一石五。有一次郭风臣借了他的粮，秋天没有还上。他就采取过去地主所惯用的手段，在大年三十晚上(除夕)到郭家讨债，郭家还不起，他就恐吓说：“如果不给，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郭家没有办法只得卖掉房子和土地还上他的债。又如他租给单干户齐福七亩土地，约定秋后交租三石，凑巧那年收成不好，齐福打算先还五斗，其余的以后再还。李长青听说就气势汹汹地找到齐福家说：“约定是三石，就得还三石，少一石也不行”。李长青不仅出租土地剥削别人，并且还剥削起小孩来了。他用一天五角钱的报酬雇佣小学生给他除草。在统购统销运动中，他把余粮偷偷地卖给私人，从中取利。

又如：解放前在地主家吃劳金的阮景山，土改后卖掉分给他的土地，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粮食，放给地主富农，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被打倒的，借去以后不敢不还。利息是春借一石，秋还一石五。他不仅放粮食放高利贷，而且还放货币高利贷，如一九五七年他用百分之三利息借给沈家六十元。一九五八年沈家没有还上，他就把沈家的牛牵走做为抵押。

这种事例在太兴虽然是个别的，但却很严重，因此党支部就在这次辩论中提出来，交给群众进行辩论。

辩论之初，单干户郎永财还给李长青辩解：“租地是两家自愿，李长青没有错！”

但是群众却用算细帐和回忆过去的方法，批判李长青的错误。许多人在发言中说：“我们过去都是穷人，受尽了地主的种种压迫和剥削，解放后，党领导我们打倒地主，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怎么今天你也做起剥削人的勾当来了，这不是学习地主的那一套吗？”有人说：“现在是新社会，不允许剥削存在，李长青的作法，就是剥削行为，是走旧社会的路！我们是不允许的。”

通过辩论，广大农民认清了是非，就是郎永财这样的人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李长青也开始承认了错误，他沉痛地说：“我真混蛋，实在对不起穷哥们！……解放前，我给地主扛活吃劳金，地无一壠，房无一间，幸亏共产党来救了自己；土改时又分到了土地和房子，生活慢慢好起来。但是反过来就忘了本，竟用过去地主的那套办法放粮、吃租子剥削人，这怎能叫地主不笑话咱呢？回想起来真对不起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一定要回头！”

会后他就报名参加了高级社，把全部的土地都交给了社，和大家一起劳动。通过集体劳动他更清楚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他说：“单干的时候，自己没有力量去整地，天旱地涝只能私下担惊受怕，每年从种子落到地到收割完毕，心里总是落着一块石头。可是高级社人多力量大，大伙合在一起什么也不怕了。”